

张建业 主编

李
贻
福
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

李 贽 论 丛

“‘中国李贽研究学会筹委会’
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张建业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贽论丛 / 张建业主编.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1. 10
ISBN 7-5402-1407-4

I. 李... II. 张... III. 李贽(1527~1602) - 哲学思想 - 研究 - 学术会议 - 文集
V. B248.9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2018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X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09千字
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册
定价: 15.00元

目 录

序	施永康(1)
李贽的悲剧结局	任继愈(4)
李贽在中国散文史上的位置	郭预衡(7)
略谈李贽的反封建思想	苏双碧(10)
李贽与王阳明	张建业(21)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新变的启蒙者	
李贽思想片论	张立文(34)
李贽“童心”说反文化强权的战斗意义	漆绪邦(45)
“嘉万三杰”与阳明心学	段启明(56)
《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	
.....	潘叔明 许苏民(64)
李贽之伤逝情结	张善文(74)
前卫与先锋	梁归智(88)
——论李贽思想对曹雪芹的影响	
从本色论到童心说	左东岭(97)
——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	
李贽的文学理念及其学术启蒙	李 超(111)
李贽与启蒙史学思潮的出现	钱茂伟(118)
明代泉州相继而出的两大思想家	许在全(138)
——评李贽与蔡清	
精神世界的文化生态平衡与李贽在中国	
文化史上的意义	谭邦和(147)

论李贽的师友观及其交游	林海权(152)
论李贽的治国思想	李珍梅 臧泽峰(174)
六庵论李贽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黄高宪(184)
明代泉州布衣诗人黄克晦与李贽关系 新探	陈桂炳(193)
李贽与泉州民间戏曲	李少园(203)
李贽与麻城四大望族	凌礼潮(219)
李贽与刘东星交游论略	田同旭(228)
《续藏书》注释札记	邱少华(241)

附录一：

2000年5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 举行的“‘中国李贽研究学会筹委会’ 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收到的贺信、 贺电与题辞选录	(252)
--	-------

附录二：

“‘中国李贽研究学会筹委会’ 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 超(257)
后 记	张建业(266)

序

泉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施永康

李贽出生于泉州，是泉州人民的骄傲。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素有“海滨邹鲁”之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泉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与特质。李贽既是在这一氛围与特质中成长，又是这一氛围与特质的突出代表。因此，重视和加强对李贽的研究，也是我们弘扬文化遗产、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长期以来，泉州人以有李贽这样的先贤为荣耀，从领导到学术界都比较重视对李贽的研究。70 年代，我们挖掘和整理了不少有关李贽及其家世的资料；80 年代，我们举办了全国性的李贽学术研讨会，并汇编优秀论文，由张建业、许在全同志主编出版了《李贽研究》一书。最近，我们又对李贽的故居进行了修葺。多年来我们盼望着能有一个全国性的李贽研究的专门组织，以推动李贽研究的发展。去年 5 月，“中国李贽研究学会筹委会”在众多学界泰斗的支持下成立并举行学术研讨会。现在，荟萃研讨会上优秀论文的《李贽论丛》即将面世了，这是李贽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作为我国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李贽通过《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李温陵集》等主要著作和对大量小说及戏曲的评点，猛烈抨击程朱理学，冲击封建专制统治下禁锢人们思想的围墙，对当时“浓得化不开”、“全是苦海”的黑暗社会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追求思想自由，追求个性解放，以“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原则反对虚伪，反对道貌岸然的假道学。他感时忧

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时,在楹柱上撰写了两幅对联:“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听政有余闲,不妨臂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显示了心怀百姓、为政清廉的可贵品格。人间的世态炎凉和仕途的坎坷遭遇,使李贽背叛了“读书——做官——耀祖荣宗”这一古代读书人的一般生活道途,走上了与封建专制彻底决裂的泥泞血路,终于惨遭封建统治者迫害。“举头迎白刃,一似斩春风”,他在狱中从容自裁,以死警世。他被中外学术界称为“顽强的坚决的反封建压迫反传统思想的英勇斗士”、“中世纪中国的布鲁诺”。

李贽的思想具有开拓性、超前性和强烈的进取精神,对明清两代以及“五四”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1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人民日报》发表的《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文章,把李贽列为中华民族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红旗》杂志社、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编写的《中华英杰录》,把李贽列为我国历史上83位英杰之一。这表明李贽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李贽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过直接影响,日本幕末时期著名汉学家、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吉田松阴,在思想上就颇受李贽影响。日本现代著名汉学家铃木虎雄对李贽进行过深入研究,并著有《李贽年谱》,现在也有许多日本著名学者在从事李贽的研究。这说明李贽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李贽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有过交往,并有深切友谊;比利时人金尼阁神父当时协助利玛窦在华的传教工作,和李贽也有接触,这些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都有记载。德国汉学家福兰阁在其专著和论文中对李贽的思想、品格曾给予极高评价。在美国、法国、英国、瑞士、俄罗斯、意大利等国也都有学者从事李贽的研究。特别是在东南亚诸国,居住着众多的李氏后人,很多学者都在从事李贽的研究,李贽的影响更为深远。这说明李贽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而李贽故乡泉州,则以其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积淀,创造了极富生命力的优秀泉州文化。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泉州文化融入时代精神,极大地焕发了泉州人的创业伟力和竞争潜能,一个几百年前开始式微的东南小城迅速崛起,经济总量在全国 212 个地级市中位居前列。在新世纪伟大进军中,把弘扬大泉州文化作为实现泉州现代化宏伟蓝图的核心部分,把弘扬大泉州文化作为凝聚海内外泉州人和发展大泉州经济、建设大泉州城市、实现泉州新飞跃的强大精神动力,意义尤为深远。《李贽论丛》的出版,使我们倍感泉州文化弥足珍贵,这将进一步激发我们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为指针,丰富和发展大泉州文化,加快泉州于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相信,李贽追求真理的顽强意志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必将激励人们为一切追求社会进步、树立人类尊严的崇高事业而奋发努力!

李贽的悲剧结局

任继愈

李贽曾以狂放激烈的言行,引起社会的关注,人们认为他不合时宜,性情古怪孤僻。作地方官及学校教官,为上级所不喜。退而著书、讲学,也遭到道学者们的围攻,终于以 76 岁的高龄被迫害,死于狱中。

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这样一位怪杰,值得引起治学者的深思。

研究中国哲学史,不能忽略其地区性。秦汉以后,中国是个统一的大国。这个统一的大国,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同时,为使这个大国保持巩固,除了政治上要高度集中以外,还要思想上的集中统一。为了强化集中,必须限制那些不利于集中统一的现象。

秦汉以前,中国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风俗各异。为了推进这个多民族统一大国巩固完善,中国人民花费很长时间,不断使这个制度完善。经过若干朝代的努力,达到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目的。凡事物的利弊,往往相伴出现,高度统一做到了,随之带来了原先没有的弊端。

李贽生活在明朝嘉靖、万历时期。庸劣昏聩的两个皇帝长期掌握着全国最高权力。明朝开国时期,朱元璋英武过人,而且来自民间,他废除宰相制,皇帝直接行使政府职权(指挥六部),提高了行政效率,暂时舒缓了民间疾困,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传了几代以后,接连出现几位庸劣皇帝,大小政事都要由皇帝亲手裁决,高度

集中的权力很自然地落在皇帝亲信的宦官手中。宦官包围着皇帝,形成明朝致命的祸害,宦官的祸害伴随着明朝的终结。

政治的腐败,影响到社会风气的败坏。

明朝以科举取士,造就了大批说假话的官僚。因为科举考试的答案早有规定,应试者“代圣贤立言”,不能发表与标准答案不同的意见,诱迫士子说假话。这批应试士子自幼被训练成揣摩试官的意见,随波逐流的文风,唯上是从的性格。名为学习孔孟之学,实际上背叛孔孟的宗旨。

李贽是科举考试中的过来人,深悉其中的积弊,只是如实揭示出当时一些假道学的真面目,自然地遭到多数庸众的围攻。

以个人的力量与社会力量抗争,其悲剧性的结局不言而喻。

李贽这个人的出现,与他的时代及地区文化环境的关系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泉州在宋代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李贽自幼生长在这里。泉州是李贽新思想的温床。福建又是中国理学大师朱熹一生讲学活动的重要基地,也是传统文化很发达的地区(当时文化发达的地区还有浙江、江西、湖南。福建文化最发达)。福建刻书业的兴旺可从侧面说明闽学的兴盛。李贽生长在闽学盛行、中外文化交汇的泉州,有可能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传统文化。因而感到“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①。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朝中叶以后沿海及长江下游经济比较发达,出现了手工业工场,如苏州纺织工人的集体反抗官吏盘剥即是一例。福建泉州得风气之先,在海外与内陆交会处,外来最新非传统文化(特别是早期市民的公平交易观及重商观念)与中国最系统的传统文化的接触,必然会引导有识之士认真思考。一些切近生活的实际问题,如凭本领生活(种田),将本求利(经商),与士大夫比起来,并不见得低人一等。个人合理的要求应当被认可。“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

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其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②，“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③。

如果李贽当初不是定居在湖北的麻城，最后不是定居在北京通州，而是辞官后告老还乡，回到泉州，或在深得人民拥戴的云南姚安度其晚年，即使他仍然抨击腐败，讲学收徒，所受的迫害也会相对减轻一些，也许得以终其天年。

李贽虽然以出家人的姿态，却抱着一颗火热的童心，无所顾忌地指摘社会积弊，活动在保守势力很强的内陆湖北和北京，又是孤军作战，用匕首直刺敌人的要害，其悲剧性的结局势难避免。

由于中国儒教势力过大，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过于严密、完整，新的社会因素资本主义势力，难得发展，虽有几次萌发的机遇（一次在明中叶，一次在清初），都未能成长起来，一直到鸦片战争（1840），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堡垒依然难以打破。

李贽的狂狷性格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狂狷性格、不羁言行的背后，确有它的社会基础，李贽从内心还是希望这个大明王朝祛除积病，恢复真正的纲常名教，疾恨欺世盗名、言不由衷的伪道学。只是当时新生的社会力量尚未成熟，尚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直到第一次欧洲大战期间，中国才有了真正的新生的社会力量。经济变革在先，文化思潮随之继起，李贽的真价值得以揭示出来。应该对他做出公允、可信，为多数人认可的评价。

[注释]:

- ① 李贽：《卓吾论略》，《焚书》卷3。
- ② 李贽：《藏书》卷32，《德业儒臣后论》。
- ③ 李贽：《答邓石阳》，《焚书》卷1。

李贽在中国散文史上的位置

郭预衡

我在《有明文章正宗质疑》^①一文里曾说,明代文章正宗,也许不在黄宗羲所标举的宋濂以来株守元儒传统的诸君子,而在姚江以来攻乎异端的诸狂士,狂士之尤者则有宗羲之友亭林先生所痛斥的“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李贽。我说这话,涉及了李贽在中国散文史上的位置问题。

作为“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的李贽,在正统的学人看来,他在中国散文史上是没有位置的。但从中国散文著作的源流看,李贽实在是发扬了先秦诸子发愤著书的传统,这在他的《杂说》一文里言之甚明。其言曰:“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②这里所说的“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也正是前人所说的“身与时舛,志共道申”^③。先秦诸子著书为文,大抵都有这个特点。

对于这一发愤著书的传统,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论得更为分明。他说:“太史公曰:‘《说难》、《孤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④李贽基于这样的思想,便写出了许多“发愤”而“不能自止”的文章。

对于李贽这样的文章，袁中道曾有评论。他说：“其为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⑤为文“不阡不陌”者，在李贽之前，有个张融^⑥。但张融乃南朝文人之“无特操”者，而李贽胸中之有“独见”，又与张融不同。

李贽的很多文章都是“抒其胸中之独见”的。这样的文章大抵都有“不阡不陌”、不同于宋元以来的道统和文统的特点。

袁中道论及李贽的著作时，还说：“其意大抵在于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⑦这里所谓“黜虚文，求实用”，大抵又和王充著书之“正虚妄”略同^⑧。王充著书，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⑨的，李贽之“敢于叛圣人”，敢于“毁圣”，亦如王充之“问孔”。王充之“不避上圣”，并非真反孔子；李贽之“叛圣人”，也非真叛孔子。王充所“发擿”者，主要在汉儒之虚妄；李贽所揭露者，也在于明儒之虚伪。王充对汉儒之“发擿”，是去伪存真的；李贽对明儒之揭露，也是剥皮见骨的，不留情面的。其《答耿司寇》^⑩一书，可以为例。其言曰：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为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这样的解剖分析，真是不留情面的。“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

者又公之所不讲”，揭得何其痛快淋漓。

书中又说：

今某之行事，有一不与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贵，亦有妻孥，亦有庐舍，亦有朋友，亦会宾客，公岂能胜我乎？何为乎公独有学可讲、独有许多不容已处也？我既与公一同，则一切弃人伦、离妻室、削发披缁等语，公亦可以相忘于无言矣。何也？仆未尝有一件不与公同也，但公为大官耳。学问岂因大官长乎？学问如因大官长，则孔、孟当不敢开口矣。

这一系列的质问，尤其痛快淋漓。既解剖了别人，也解剖了自己。近世学人为文，能够无情面地解剖别人，又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只有鲁迅。而李贽生于三百年前，居然写出这样的文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样的文章是更有新的时代特征的。

当然，对于这样的文章特征，在正统的学人看来，也许太不醇正。只能视为“异端”，而不能成为“正宗”。

[注释]：

① 《文学遗产》2000(1)。

②④⑩ 《焚书》卷3，中华书局，1961。

③ 《文心雕龙·诸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范注本。

⑤⑦ 《珂雪斋集》卷17《李温陵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⑥ 张融，《南齐书》、《南史》均有传。其为文“不阡不陌”，见其所撰《门律自序》。

⑧⑨ 章炳麟：《检论·学变》，《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

略谈李贽的反封建思想

苏双碧

李贽有没有反封建思想,这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李贽曾经多次谈到自己“信儒教”,他在《初谭集·自序》中说:“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被捕之后,在回答当局的讯问时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①马经伦在《与当道书》中替李贽辩护时也说,李贽是“乐圣人之道,诠圣人之经,若世所梓行《易因》及《道古录》诸书,真上足以阐羲、文、孔、孟之心传,下足以绍周、邵、陈、王之嫡统者也。”不少论者以此为依据,认为李贽并没有反封建的思想,而是代表了地主阶级中不当权的一派。其实李贽这几种说法都是可以作具体分析的,在封建社会,儒可以有多种含义,即儒生、知识分子,以及儒学、儒家思想等等。在僧、儒之间,李贽虽落发,但不脱俗,有时虽也讲佛,但讲当道、讲诗书更多。至于圣教,是经李贽改造过的圣教,即李贽理解的圣教,并非理学家推崇的圣教。而所谓代表地主阶级不当权的一派,也很勉强,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历朝都有不当权的一派,而且人数远比当权的要多得多,试问,有谁如同李贽一样反儒非孔?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来。

不过,不论是李贽曾经说过自己是“儒”,或者别人说他遵奉“圣教”,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贽的思想体系和特征是否有反封建的内容。因为,在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过渡之时,新旧思想往往在同一个人物身上表现出来。李贽所处时代,一是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二是世界资本主义正在欧洲蓬勃兴起。这就为古老中国的个别敏感的知识分子思想发生变化提供了

时代的可能。李贽的思想体系,不论是非孔评儒,还是批判假道学,宣传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平等,都是李贽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自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就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子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历史上也出现过王充一类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但都没李贽激烈、明确。下面围绕李贽对封建思想的批判,谈三个问题。

其一,批判假道统,矛头实指封建主义。假道学实际上是被宋明理学奉为正宗的孔孟之道。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以孔孟之道为主线的意识形态,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西汉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树立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唐代韩愈编制道统,对孔子思想进行又一次改造,进一步树立儒学的统治地位。宋明理学阐发经义,以正宗儒学自居,目的都是树立孔孟的权威,禁锢人们的思想,把“忠君”说成是封建社会最高的道德规范,而“愚忠”则是臣民的天职。宋明理学提倡对孔孟之道的“至尊”,其实是“忠君”思想范围的扩大,把庶民的生活、起居等行为都纳入宋明理学提出的规范之中,千方百计论证了封建秩序、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是顺乎天理的,而在政治上则论证了封建皇帝的独尊地位,论证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镇压的合理性。宋明理学在思想史上,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流派,自有它真知灼见的一面,不能一概否定。但从思想发展史上看,“宋明理学浸润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成为权威性的支配力量,是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华盖。从政治上看,它是思想史上的浊流”^②。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宋明理学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李贽正是处在这种“华盖”的重压下奋起批判假道学的。

孔子在经过道学家们一番装饰之后,成为封建社会的绝对神圣,谁要对孔子有所不敬,谁就是叛逆。然而,李贽却毫不畏惧,敢于担当“叛逆”的罪名。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

道学先生则尤恶。”这里所说的“道人”、“道学先生”，实际上都是指那些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学家。他声明要与历史上“百千万人作敌对”，要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来批判封建理学。由于道学家们都是打着孔子的旗号，贩卖假道学货色，李贽批判假道学必然会把矛头指向孔子。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说：“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则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他指出，千百年来的“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理学家们倡言“存天理灭人欲”，高唱在“修身”时要有大公无私之仁。李贽针锋相对，认为人都有自私的欲望，都有趋利避害之心，称得上圣人的人，必顺民之私欲。）他在《藏书·德业儒臣后论》中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这种私心人人都有，孔子也不例外。李贽指出：“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话讲得很实在，又是至理之说，但以孔子为例，却要有很大的勇气。既然人人都有私欲，孔子怎能例外？如果没有官当，没有俸禄，孔子连一日也不可能在鲁国安心呆下去。

有一件事，经常使人不解，或者引以为李贽“尊孔”之说的，就是李贽在龙潭芝佛院供孔子像。自称为“异端”的李贽，却供起孔子像，于情于理都不协调。但是，人们只要读一下他的《续焚书·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就会明白其用意了，他说：“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则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矇